

高市内阁执政以来日本“再军事化” 加速的动向、逻辑与影响^[1]

徐万胜 王佳睿

【内容提要】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以来，日本“再军事化”步伐明显加速，且政策内涵更具体系性、进攻性。高市内阁从防卫、经济、外交多领域同步推进：推动防卫力量实现全面变革，谋求突破防卫政策的既有限制，大力发展防卫产业与军民两用技术，深化日本与盟伴国家间的安保合作，恣意突出防卫政策调整的中国因素。同时，高市内阁依赖2026年2月众议院选举后形成的“高市一强”权力结构，强势推进相关政策落地。高市内阁加速推动日本“再军事化”，从根本上讲是源于其实行绑定国家安全的经济增长政策，以及对政商军工复合体、社会政治意识右倾化的因应。这一进程对日本国内民生发展、地区安全局势及战后国际秩序均造成严重危害，更直接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关键词】高市内阁 再军事化 新型军国主义 日本自卫队 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徐万胜，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佳睿，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6) 04-0128-25

[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战后美日对华核叙事的体系构建与因应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5YJCZH28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2025年10月21日，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首相指名选举中当选并随即组阁执政。随着高市上台以及日本自民党在2026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日本“再军事化”步伐明显加速。

在日本，“再军事化”是与二战后初期“非军事化”民主改革相对而言的概念。广义上讲，以1954年自卫队与防卫厅的成立为标志，日本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开启了重整军备的“再军事化”进程。此后七十余年，日本“再军事化”进程以“强化防卫力量建设”与“突破防卫政策限制”为核心，整体呈现“线性”上升态势，其价值取向长期与追求“战略自主”“自主防卫”等目标诉求相绑定。

值得警惕的是，高市内阁执政以来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政策的调整变化，已远超出这条“线性”轨道，最显著的特征是“加速”与“扩维”的同步发生。日本“再军事化”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防卫领域，而是向防卫、经济、外交多领域同时渗透，并与“新型军国主义”倾向抬头相互叠加。其价值取向已经突破了“战略自主”等既往诉求范畴，转而迈向一条体系性松绑、制度化扩军的危险道路。这种畸变的危险之处，不仅在于它或重演历史上的军事冒险路径，更在于它以“正常国家化”“与国际标准接轨”为包装，通过合法松绑，使扩军备战变得制度化、长期化和难以逆转。“再军事化”与“新型军国主义”倾向的叠加共振，必将对日本国家发展、地区安全及国际秩序造成严重危害。

一、高市内阁的政策取向与日本“再军事化”表征

执政伊始，高市内阁便以“提前一年修订安保三文件”为抓手，迅速启动对国家安全保障政策框架的系统性重塑。2025年11月6日，高市内阁首次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1]，确定将在2026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11月20日，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也召开会议，正式启动修订

[1]「高市内閣、初のNSC開催 安保3文書を議論」、『時事新聞』2025年11月6日。

讨论，行政与政党两条线同步推进。2026年4月20日，高市内阁进一步设立“从综合国力视角思考国家安全保障有识者会议”。4月27日，高市在该会议的首次会议上强调，要以俄乌冲突及中东局势为教训，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并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1]其用意十分明确：要将“新型作战方式”与“长期战争准备”这两个具体军事目标，嵌入“综合国力”这一宏大的政策框架之中，为突破现行安保体制提供理论合法性。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周期通常在五年以上，高市内阁却执意将2022年版“提前一年”修订。这绝非简单的日程调整，而是意在打破防卫政策调整的“既有节奏”，通过全方位政策路径推动日本“再军事化”进程骤然提速。

2026年8月，日本防卫省公布了高市内阁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全文598页，篇幅创下历年最高纪录，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作为高市内阁“再军事化”路线的系统性政策宣示，白皮书的核心内涵，包括编造威胁叙事、谋求远程进攻能力、扩张防卫产业等，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在为年底前完成“安保三文件”修订进行前期舆论铺垫。相关政策动向集中体现在防卫力量建设、政策禁区突破、政府重点扶持、盟伴网络扩张、操弄“台湾有事”五个维度。

（一）防卫力量建设：从“专守防卫”向“体系性进攻”转型

高市内阁推动防卫力量转型，最直观的信号是防卫费的急剧膨胀。2022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原本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的GDP占比提升至2%，但高市内阁通过补充预算案，2025年度防卫相关经费（含初始预算与年末补充预算）便已逾11万亿日元，较2024年度的8.78万亿日元猛增25.3%，提前两年实现达标。^[2]作为防卫相关经费的主体，防卫力量

[1] 「新しい戦い方や長期戦への対応必要と首相」、YAHOO! JAPAN、2026年4月27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770a08ee95e2aa2e8a36ed52dbf67128d1324a23>。

[2] 2025年11月28日高市内阁通过的补充预算案中防卫相关经费高达1.1万亿日元。其中，防卫力量整備计划经费核定为5021亿日元，驻日美军整備事业经费核定为3451亿日元。参见「今年度の防衛費、GDP比2%前倒し達成へ 補正予算案で積み増し」、「朝日新聞」2025年11月29日。

整備计划经费从 2024 年度的 7.72 万亿日元和 2025 年度的 8.47 万亿日元，增至 2026 年度的 8.80 万亿日元，三年间增长超过 1 万亿日元。^[1]

2025 年 12 月底，高市内阁会议通过的 2026 年度初始预算案中，防卫相关经费实现连续 14 年增长，攀升至 9.04 万亿日元的历史新高。由于下半年还将提交补充预算案，2026 年度防卫相关经费总额预计将进一步突破上年水平。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构建“防区外防卫能力”等，具体预算列支包括：改进型 12 式岸对舰导弹等采购费 1770 亿日元；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等采购费 387 亿日元；极超音速导弹及地面装置采购费 301 亿日元；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的下一代空战平台“全球空中作战计划”（GCAP）项目列支 1602 亿日元；与 GCAP 战机协同作战的无人僚机研发费 48 亿日元。此外，以无人装备为核心的多层级沿岸防卫体系建设费 1001 亿日元也被纳入预算。^[2]在持续高涨的防卫费支撑下，高市内阁正着力推动防卫装备建设与自卫队组织架构重组，其“专守防卫”的名义外壳被进一步剥离。

在防卫装备领域，作为“防区外防卫能力”的落地体现，2026 年 3 月底，日本防卫省宣布在熊本县健军驻屯地和静冈县富士驻屯地分别部署“25 式地对舰导弹”（射程约 1000 公里）和“25 式高速滑翔弹”（射程约 500 至 900 公里）。这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3]两款导弹虽名为“对地/岛屿防卫”，实则均具备对陆地目标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与此同时，美国已开始向日本交付“战斧”巡航导弹，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于 2026 年 7 月完成首次实弹发射测试。至此，日本“自研+引进”的远程打击体系确认成形。

在无人作战体系建设方面，“SHIELD（盾牌）构想”是防卫省 2026 年度重点推进的建设项目，旨在通过分布式、低成本、可消耗的无人装备，

[1]「防衛力抜本的強化の進歩と予算」、防衛省、mod.go.jp/j/budget/yosan_gaiyo/index.html。

[2]「防衛費、過去最大の 9 兆円超で調整 2026 年度当初予算案」、『朝日新聞』2025 年 12 月 18 日。

[3]「防衛省が長射程ミサイル初配備 自衛隊が反撃能力『保有』段階へ」、『毎日新聞』2026 年 3 月 31 日。

构建覆盖空、海、潜的一体化协同作战体系。为统筹支撑该构想的 AI 赋能，陆上自卫队于 2026 年 4 月设立“无人资产防卫能力推进室”与“无人装备室”，防卫省也同步设立“AI 活用推进室”，以打造由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构成的新型作战方式。

在自卫队组织架构领域，高市内阁于 2026 年 3 月启动海上自卫队自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编制体制调整，对其主战力量进行“进攻化改组”。海上自卫队取消沿用数十年的“护卫舰队”编制，新设“水上舰队”，将原来 4 个“护卫队群”整合为其下辖的 3 个“水上战群”，同时增设“巡逻防卫群”“两栖战与水雷战群”，意在强化远海机动与联合进攻能力，进一步凸显其围绕岛屿攻防的作战意图。同时，高市内阁还将触角伸向太空这一新兴作战领域。2026 年 6 月，日本国会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计划于本年度内把航空自卫队改组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将约 670 人的“宇宙作战团”升级为规模 880 人的“宇宙作战集团”。这意味着日本正加紧绕开和平宪法下陆海空等传统领域的战后军备约束，将太空当成“突破口”，借太空赛道稳步推进其“军事正常化”。与之相呼应，西南方向的兵力部署也在同步升级：驻那霸市的陆上自卫队将从 2200 人的第 15 旅团升格为 4000 人的第 15 师团，作战职能随之从“区域防御”转向“主动岛屿攻防”，为日本武力介入地区局势提供实质性军事支撑。

此外，为强化与日本“再军事化”相适应的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2026 年 5 月，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7 月 31 日，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同日召开首次会议，并着手制定首部《国家情报战略》。新机构由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被赋予跨部门强制统筹权，构建起以首相官邸为核心的一元化集权体制。该体制不仅使自卫队能够更加有效地获得政府及其他情报机关的外部支援，更存在对日本民众及他国目标实施情报监控的滥用风险。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批评称，“这与‘建设战争国家’别无二致，其真实意图在于配合远程导弹的实战应用，与美国联手强化情报收集能力”。^[1]事实上，由于该

[1]「『国家情報會議』法案 衆院通過 参院で徹底審議、廃案を田村委員長が会見」、『赤旗』2026 年 4 月 24 日。

机构在权力架构、职能定位上与战前“特高课”高度趋同，即顶层集权、内外双控、监督缺失。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特高课”幽灵正在“借尸还魂”。

（二）政策禁区突破：核议题试探与武器出口放开

对于二战后历届内阁一贯坚持的“无核三原则”，即“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高市内阁的态度耐人寻味。2025年10月，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就任记者会上被问及是否考虑将核能用于潜艇动力时，表态称“希望在不排除所有选项的前提下展开研讨”，为核武装打开想象空间。^[1]同年11月，高市早苗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避谈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而早在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她就曾主张有必要围绕“不引进”展开讨论。^[2]此后，日方高层频频释放危险信号：2025年12月，首相官邸负责安全保障政策的官员公然宣称日本有必要保有核武器^[3]；2026年7月，小泉进次郎以近期芬兰允许战时部署核武器等动向为例，妄称日本必须毫无忌讳地讨论核议题的所有政策选项。^[4]上述言论表明，高市内阁正试图为日本开发核潜艇及日美进一步强化“延伸威慑”探路，一步步撕开“无核三原则”的防线。

在常规武器出口领域，高市内阁的动作更为直接。2026年4月，日本内阁会议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消将武器出口限定在“救灾、运输、警戒、监视、扫雷”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规定，从“原则上禁止”转向“原则上允许”武器出口，“非武器”类装备出口不设对象国限制；“武器”类出口对象限定为与日本缔结相关协定的国家，甚至允许在“特殊情况下”

[1]「小泉防衛大臣原潜の『選択肢を排除せず』」、YAHOO! JAPAN、2025年10月23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160631e7d856a88d9cb70eec92590abd0066c5bb>。

[2]「首相、非核三原則堅持明言せず 安保3文書改定巡り」、YAHOO! JAPAN、2025年11月11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2402fafd57680d655a7cff3864f8c674b89e54cc>。

[3]「日本の核兵器保有が必要と官邸筋」、YAHOO! JAPAN、2025年12月18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b7d75fe78603b79de5ca35214e5929d0ede4cf9f>。

[4]「小泉防衛相『核に触れざるを得ない』欧州を例に核政策の議論求める」、『産経新聞』2026年7月17日。

向“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出口杀伤性武器。^[1]其深层意图在于，让日本军工企业借助海外订单分摊巨额前置投资，维持生产线全年运转、拉动装备技术迭代升级，搭建“平时”与“战时”无缝切换的防卫产业体系。

无论是核议题的“禁忌试探”，还是武器出口的“原则反转”，其根源均指向日本宪法第九条的约束。正因如此，高市内阁将矛头对准宪法本身。2026年4月，高市在自民党大会上明确提出：“提交修宪议案的时机已经到来，希望在明年党大会召开前完成相关筹备。”^[2]其核心主张就是将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第九条，赋予其合宪身份，以求从根本上突破一系列防卫政策的既有限制。

（三）政府重点扶持：大力发展防卫产业与军民两用技术

高市内阁通过财政投资、政策倾斜等系列举措，大力发展防卫产业与军民两用技术。2025年11月，高市内阁成立“日本增长战略本部”，将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技术、航空航天、防卫产业等17个战略领域列为优先投资方向，明确以防卫产业为先导，通过政府采购撬动市场需求^[3]；随后推出总额为21.3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对策计划，其中7.2万亿日元定向投入上述领域。2026年7月，高市内阁出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即“骨太方针”），并通过《官民投资路线图》提出：至2040财年，政府与民间在上述领域计划累计投资超过370万亿日元。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领域大多兼具军民两用属性。

发展军民两用技术的落脚点，是提升日本的持续作战能力。以无人机产业布局为例，日本已将无人机定位为低成本消耗品，并加速构建国内大规模量产能力。2026年5月，防卫相小泉提出要“搭建起大规模运用国产

[1] 「【速報】政府、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を改定 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の輸出“原則として認める”」、YAHOO! JAPAN、2026年4月21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c6a397da97de5cbd23bd2bd80e20ef98c00c3fea>。

[2] 「憲法改正発議『機は熟しつつある』自民・鈴木俊一幹事長 来年の党大会までに目途」、「産経新聞」2026年4月12日。

[3] 「AI・造船・防衛など17戦略分野に重点投資…高市首相きょう表明、それぞれ担当閣僚指定へ」、「読売新聞」2025年11月4日。

无人机的产业基础”，并透露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已撤销对武器相关业务的投资限制。^[1]2026年上半年，日本头部无人机企业特拉无人机（Terra Drone）通过设在爱沙尼亚的欧洲子公司，分步完成对乌克兰两家军用无人机制造企业的控股收购与全面整合^[2]；7月，日乌宣布成立“日乌无人机产业集群”（JUDC），5家日本企业入局。日方以“民间合作”为伪装，实则将俄乌战场转化为无人作战技术的实战试验场，把战场验证过的技术定向转移回日本本土，同时推动日乌在拦截、侦察、水陆两栖、第一人视角（FPV）等多种军用无人机技术上的合作，并协助乌扩大无人机产能。^[3]此外，高市内阁还在内部研讨设立战时国营军工工厂，以“国有民营”模式强化弹药、导弹等消耗型武器装备的量产能力，意在从产业根基上夯实日本的持续作战能力。^[4]

（四）盟伴网络扩张：日美同盟框架下的“对外军事投送”布局

高市内阁仍将日美同盟定位为日本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的基轴，着力推动双方从“同盟协作”向“一体化融合”演进。在战略层面，日本主动对接美国的“第一岛链拒止威慑”布局，将自身打造成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前沿作战枢纽；在指挥层面，日美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加速重构，自卫队逐步融入美军作战链条，双方在情报共享、目标锁定、火力协调等环节的融合程度已达历史高点。在此框架下，加强防卫产业与技术合作、提升联合军演水平成为双方深化合作的两大重点。

[1]「小泉大臣、防衛産業支援を強調 国産ドローン企業を視察」、YAHOO! JAPAN、2026年5月20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ab5cb2ea8d3221fc6912419f9171fca742dfd159>。

[2] Nikkei Asia, “Japan’s Terra Drone buys 2 Ukrainian drone makers in global push,” June 16, 2026,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business-deals/japan-s-terra-drone-buys-2-ukrainian-drone-makers-in-global-push>.

[3] 参见 Dominic Culverwell, “Japan breaks into Ukraine’s drone market for first time as Tokyo confronts regional threats,” The Kyiv Independent, March 31, 2026, <https://kyivindependent.com/japan-breaks-into-ukraines-drone-market-for-first-time-as-tokyo-confronts-regional-threats/>。

[4]「防衛装備工場の国有化を骨太明記 継戦能力確保、ウクライナ教訓」、YAHOO! JAPAN、2026年6月24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43e8c95fbc1f043cbc6e4b7e523de144193376b4>。

在产业与技术合作方面，日本正逐渐嵌入美国“印太”军事供应链，日美从“联合研发”迈向“联合量产”。2026年3月，日美首脑在华盛顿会晤，双方决定将“标准-3”Block 2A 拦截导弹在日本国内的生产规模扩大至4倍，并探讨日本在空对空导弹产能方面扮演的角色。^[1]这标志着三菱重工等企业的生产线正被纳入美国“印太”反导与防空体系。对美国军工体系而言，日本在强化“联合研发者”角色的基础上，正在成为“关键产能的补充者”。

在联合军演方面，日美双方确认将扩大联合训练，并将西南诸岛作为重点演训方向。2026年6月下旬，日本自卫队全方位参加了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美军“堤丰”中导系统则趁势部署到海上自卫队的鹿屋航空基地；同月，在日美“坚毅之龙2026”演习中，双方在九州、冲绳及西南诸岛多个据点展开实兵演训，并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9月，日美澳三国将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堤丰”系统将再次参与。此外，日美两国还于2月18日、6月8—9日相继举行了两轮“延伸威慑”政策磋商，美国明确承诺将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威慑力量防卫日本，双方正在探讨如何推进这一政策承诺的实操化落地。

以日美同盟为支撑，高市内阁亦加速编织与所谓“印太”、欧洲伙伴的防卫合作网络，机制化建设全面铺开。2025年12月，日本与越南首次举行副部长级外交与国防“2+2”会谈，并与新西兰签署《物品与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和《情报保护协定》（ISA）。2026财年，日本“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项目预算升至181亿日元，同比增幅逾1.2倍，其与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准同盟”国的防卫合作更是取得实质性进展：2026年4月，日澳正式签约，以“共同开发”模式向澳方出口11艘改进型“最上”级通用护卫舰，其中首批3艘由三菱重工长崎厂建造，其余8艘则将在澳本土建造。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大规模对外出口主战装备，也是澳海军史上最大规模的舰艇采购订单。2026年1月，日菲签署ACSA；4月，美菲“盾牌”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首次以正式参演方身份亮相，派出约420人。这也是二战后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出现在菲律宾本土。同月，美菲“肩

[1] 「日米首脳会談合意内容は対米投資科学技術防衛協力安保」、NHK、2026年3月20日、<https://news.web.nhk/newsweb/na/na-k10015080411000>。

并肩—2026”军演中，日本还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的 88 式岸基反舰导弹。5 月，高市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会晤，宣布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谈判。与此同时，日本深度嵌入美菲澳小多边安全框架。2025 年底以来，日本多次与美菲澳在南海及周边开展三边、四边联合巡航与联演，以“航行自由”之名行搅局之实，严重破坏地区安宁。

在欧洲方向，高市内阁通过绑定北约来深化日欧防卫合作，加速其“再军事化”进程。2026 年 3 月，日本防卫相和德国防长讨论了两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RAA）的议题；4 月，北约 30 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集体访问日本，双方敲定情报共享、联合军演、防卫产业协同三大合作板块，标志着北约与日本的安全合作已从“个别接触”升级为“机制化对接”。除推动北约核心成员国常态化赴日参加联合军演之外，2026 年 6 月，日本正式派遣 4 名自卫官常驻德国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与训练司令部，期限一年，以系统获取新型作战方式、特别是无人机技术的实战经验。

（五）操弄“台湾有事”：高市内阁对华军事围堵的动员令

高市内阁推动强军扩武，有其内在的战略惯性，而其核心操盘手法，正是基于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一错误认知，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通过炒作台海、东海、南海议题，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与海洋权益的正当行动，高市内阁刻意营造日本周边安全环境“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虚假叙事，将“中国因素”从外部变量转化为内部扩军的驱动力，为防卫政策层层突破与对外军事合作加速铺展披上“正当性”外衣。

在涉台问题上，高市早苗一改此前历任首相均避免直接表明政策立场的做法，公然宣称日本可能依据国内安保立法武力介入台海局势。2025 年 11 月 7 日，她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就台海局势答辩时妄言：“若动用军舰且伴随武力行使，在我看来，这无疑属于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的情况。”^[1]

[1]「高市首相、台湾有事『存立危機事態になりうる』武力攻撃の発生時」、『朝日新聞』2025 年 11 月 7 日。

日本现职首相声称“台湾有事有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尚属首次。根据2015年出台的安保相关法案，如果认定构成“存亡危机事态”，即使对方未直接攻击日本，日本也可行使集体自卫权。2026年1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再次妄言，“台湾一旦发生重大变故，我们必须去营救日本人和美国人。当采取共同行动的美军遭到攻击时，日本如果毫无作为地逃回国内，日美同盟将瓦解”。^[1]高市的涉台谬论并非止步于个人表态，而是已被嵌入日美同盟的议事日程。2026年3月，日美首脑会谈后白宫发布的成果文件载明：双方“一致认为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是地区安全与世界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共同反对任何以武力、威慑为手段的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日方推动涉台议题写入日美新一届政府共同政策文件，进一步暴露出日本为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制造法理与操作空间的企图。^[2]

在防卫力量部署方面，高市内阁着力强化以应对“台湾有事”为目标的“西南防卫”。2026年2月，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明确表示，计划2030年度在日本最西端、距离台湾约110公里的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03式中程地对空导弹部队。^[3]

与此同时，高市内阁蓄意将东海、台海、南海三个议题进行捆绑，在推进日本“西南防卫”的基础上，又向南延伸以菲律宾为战略支点，妄图通过三海联动的方式配合美国对华实施军事围堵。此外，高市内阁还提出“强化太平洋防卫”战略构想，其主要举措包括：拟在北大东岛部署移动式警戒管制雷达，在南鸟岛建设导弹射击场并扩建飞机跑道，在硫磺岛完善可供大型船舶靠岸的港口基础设施。^[4]同年4月，日本防卫省设立“太平洋防

[1]「外交・安保巡る高市首相発言が波紋 台湾有事『逃げれば同盟崩壊』【2026衆院選】」、「『時事新聞』2026年1月30日。

[2]「日米首脳会談合意内容は対米投資科学技術防衛協力安保」、NHK、2026年3月20日、<https://news.web.nhk/newsweb/na/na-k10015080411000>。

[3]「小泉防衛相、沖縄・与那国島へのミサイル配備は『2030年度』」、「『毎日新聞』2026年2月24日。

[4]「安保3文書に『太平洋の防衛強化』明記へ…港湾や滑走路・レーダー網整備し中国に対抗、来年度から硫黄島調査」、「『読売新聞』2026年1月11日。

卫构想室”，以统筹太平洋方向的防卫规划与预算。这表明，日本不仅妄图威慑台海，还想在太平洋“第二岛链”对华实施军事围堵。

二、高市内阁的权力运营与日本“再军事化”决策

高市内阁相关政策举措的顺利推行，离不开日本国内政治格局的强力支撑。由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联合组建的高市内阁，其权力运营方式与日本“再军事化”之间有着高度的适配性。而2026年2月众议院选举后形成的“高市一强”权力格局，则为这一进程装上了政治引擎。

2026年1月，高市抓住内阁支持率较高的窗口期，提前解散众议院。2月8日投票结果揭晓，自民党一举赢得众议院465个议席中的316席，不仅刷新了该党自1955年建党以来所获议席的最高纪录，并成为日本政坛首个单独跨越三分之二门槛的政党。2月18日，高市在国会首相指名选举中再度当选，开启第二届内阁。选举后，朝野各党协商确定，众议院27个常任委员长、特别委员长及审查会长职位中，执政党占据25席，在野党仅剩2席。这意味着，众议院的立法节奏将完全按照执政党的节拍运转，在野党的阻击空间被压缩至极限。在此权力格局下，即便提案在参议院遭到否决，高市内阁仍可凭借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席位，以“强行表决”的方式获得通过。

（一）在野党制衡能力基本失效

在2026年众议院选举中，对高市内阁的政策取向持反对态度的左翼政党势力遭到“团灭”式削弱。日本共产党明确反对“大幅增加防卫费”，并要求“废除安保法制”，所获议席数由8席降至4席；令和新选组提出“中止5年内将防卫费增至43万亿日元的倍增计划”，仅获1席；社民党明确反对增加防卫预算，提出“停止扩充军备预算，中止为保障军费而增税”的主张，失去所有议席。^[1]曾作为众议院第一大在野党的立宪民主党，此前

[1] 「【もつと投票の前に】『平和』をどう守る？各党の安保政策」、YAHOO! JAPAN、2026年1月30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c05bdb3f7b71bfcc4a70f6beeb30aed62441ab9ea>。

主张“废除 2015 年安保法中违宪的部分”。但在选举前与公明党合组新党“中道改革联合”后，其政策立场发生根本性翻转——放弃长期以来对安保法合宪性的质疑，转而予以承认。即便如此，该党同样遭受惨败，所获议席从 172 席骤减至 49 席。而数字背后，是日本国会制衡结构的深层裂变。最大在野党尚且放弃了对“安保立法”合宪性的根本质疑，遑论其他小党。在野党对“再军事化”的国会立法制衡能力已被严重削弱。高市内阁推动修宪扩军、解禁武器出口等议程时，在野党只能就“程度”和“范围”进行有限争论，而无法从“合宪性”层面予以根本否决。

这种制衡能力的削弱，很快就体现在国会人事安排上。作为修宪辩论主战场的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起用了与高市关系密切的保守派古屋圭司担任会长；众议院运营委员长一职，也由支持高市的麻生派成员山口俊一接任。相反，主张“决不允许战争”的日本共产党由于势力弱小，无法向众议院运营委员会派出委员，也因此失去了在众议院进行代表质询的资格。从议席数量到关键职位，在野党对高市内阁的牵制空间已被压缩殆尽。

（二）高市执政姿态日趋强硬

因自民党单独跨越三分之二议席门槛而形成的众议院“巨大执政党”局面，直接催生了“高市一强”的权力格局。这一格局在自民党内则得到进一步固化：2026 年 5 月，支撑高市的自民党内部议员联盟“国力研究会”召开首次会议，该党所属 417 名两院议员中有 347 名加入其中，占比超过八成。从众议院三分之二多数到党内八成议员集结，“高市一强”的权力基础由此成型。这一党内压倒性支持，为高市推行强军扩武政策提供了坚实的政治资本。

首先，在人事安排上，高市打破惯例，将防卫系统出身的人员配置到关键岗位，深度嵌入决策过程。前防卫次官增田和夫担任“内阁危机管理监”，这是自 1988 年该职位设置以来首次起用非警察厅出身的官员；前航空自卫队补给本部长尾上定正担任负责国家安全保障的首相辅佐官；防卫省出身的有田纯担任首相秘书官。而高市 2025 年 10 月上任后的两个月内，与其

会面次数最多的官员，是负责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综合协调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市川惠一，共达 43 次。^[1]

其次，在决策风格上，高市趋向“独断即决”。以 2026 年度预算案的国会审议为例，虽然预算案的国会审议工作因众议院选举而推迟，但高市内阁仍执意通过缩短审议时间而尽快予以通过：与 2025 年相比，预算案的国会审议天数从 33 天大幅缩短至 15 天，审议时长也从以往惯例的 80 小时缩短至 59 小时。2026 年 2 月 20 日，在高市首相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强大”“强化”“强韧化”等词汇被反复提及约 50 次。高市此前寻求在野党合作的低姿态已不见踪影，原本意在谨慎形成共识的“众议”二字也消失了。^[2]种种迹象表明，高市在稳固执政根基之后，愈发排斥异议，推崇所谓“果断”的决策风格。这意味着，高市内阁将推动国会以强行表决方式通过那些朝野分歧较大的安保立法。

第三，在执政联盟内部，高市内阁加速日本“再军事化”的政策取向，得到日本维新会的支持乃至牵引。相较于高市代表的自民党，日本维新会有关安全保障的政策主张更趋保守强硬。对高市内阁而言，日本维新会是“加速器”，而非此前公明党所扮演的“刹车”角色。例如，日本维新会在 2026 年众议院选举的竞选纲领中明确提出：要通过修改宪法为集体自卫权全面松绑；重新定义“专守防卫”原则，将自卫队武力行使从“必要最小限度”转向“积极防御”；启动在国内部署美国核武器并共同运作的“核共享”讨论。^[3]这三项主张，每一项都触及日本战后和平体制的根基，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抛弃“专守防卫”，再到拥抱“核共享”，日本维新会的政策坐标已彻底偏离和平宪法轨道。关于高市内阁与日本维新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东京大学

[1]「首相面会、安保局長が 43 回最多 日中対立、政高党低の状況反映」、YAHOO! JAPAN、2025 年 12 月 30 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c270066034518a6a5b9a626846019af88dee5696>。

[2]「消えた『衆議』の二文字 高市首相の施政方針演説」、「時事新聞」2026 年 2 月 21 日。

[3]「維新八策 2026 個別政策集」、日本維新の会、2026 年 2 月 6 日、<https://o-ishin.jp/policy/8saku2026.html>。

教授境家史郎指出：“（高市）若将强化安全保障政策和修宪置于优先位置，与日本维新会的合作便畅通无阻。这也将成为政权进一步右倾的诱因。”^[1]

最后，在外部支撑上，高市内阁的强势权力运营，得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额外”背书。2026年2月5日，正值日本众议院选举前夕，特朗普在其“X”账号上公然发声，称“高市首相与联合政权的工作理应得到高度评价”，祝愿高市能够赢得选举，并表示期待3月19日在白宫迎接她。四天后，高市在其“X”账号上发文致谢，投桃报李之意尽显。一国元首在另一国众议院选举期间公开为特定候选人站台，在国际外交实践中极为罕见。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长志位和夫直言，“这是违反国际法、粗暴干涉内政的行径，日本政府应就此提出抗议”。^[2]

（三）决策失控风险持续攀升

“高市一强”格局的最直接效应，是为日本“再军事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国内政治护航。在内部缺乏对手制衡、外部获得美国支持的情况下，高市首相在决策过程中的“独断专行”倾向，已开始挤压议会制民主主义的运作空间。这种压制效应已有前例。前外相冈田克也因在国会审议中向高市提出质询，便在众议院选举中遭遇毫无事实依据的诽谤中伤。冈田本人坦言：“这会产生寒蝉效应。如果‘对高市女士严厉质询就会遭到报复’成为共识，国会审议就名存实亡了。”^[3]

这种压制效应不止于个案。新的众议院势力在安全保障政策领域已向高市内阁明显“靠拢”，其部分政策主张甚至比高市内阁更为激进。2026年2月共同社调查显示，81.1%的当选众议员赞成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

[1]「高市首相の登場：『安倍路線』純化の方向へ」、YAHOO! JAPAN、2025年10月23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a29138f1524475cd35e4b50893d1ec3516a7f141>。

[2]「トランプ大統領“高市首相支持”内政干渉政府は抗議を」、赤旗、2026年2月7日、https://www.jcp.or.jp/akahata/aik25/2026-02-07/2026020701_02_0.php。

[3]「中道・岡田克也氏『中国のスパイ』デマ情報にコメント『国会審議そのものが死んでしまう』」、YAHOO! JAPAN、2026年2月15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716cbac7a9c7d4f26bec1419e7ea2ce349f08ce5>。

承认其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合法地位。^[1] 每日新闻社的调查则显示, 37% 的当选议员对美日“核共享”持积极探讨态度, 较 2024 年的 25% 上升了 12 个百分点。^[2] 这两组数据揭示了一个事实, 在野党不再充当“刹车”、执政联盟内部只有“加速器”的情形下, “再军事化”决策的机制性障碍已被基本清除。

三、高市内阁加速日本“再军事化”的内在逻辑

高市内阁加速推动日本“再军事化”, 是国际秩序变动与其国内政治生态演变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秩序进入动荡调整期, 美国积极推进大国竞争战略并在亚太地区强化遏华同盟体系建设, 中国综合实力快速发展, 这些外部变量无疑是日本政府调整国家安全保障政策的重要考量。美国持续要求日本强化自主军力、替其分担同盟责任, 并默许日本突破战后约束, 为“再军事化”提供了关键的外部纵容。

外因只是条件, 内因才是根本。高市内阁执意加速“再军事化”进程, 无疑与高市本人浓厚的右翼政治理念直接相关。她力图摆脱战后体制、以“正常国家化”为旗号推进军事大国化。但更深层的原因, 在于高市内阁对日本政治结构演变与社会生态右倾化的主动因应与利用。

(一) 经济逻辑：以防卫产业拉动经济增长

高市内阁的经济逻辑, 是将“防卫产业”定位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其经济政策本质是将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与国家安全深度绑定, 带有浓厚的“风险预防”与“安全优先”色彩, “经济强劲增长”与“防卫强化”在相当程度上互为表里。2026 年 2 月, 高市在国会首次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出“负责任的积极财政”, 并抛出“危机管理投资”与“成长投资”这两个核心概念。

[1] 「9 条に自衛隊明記、賛成 81% 衆院選当選者アンケート分析」、YAHOO! JAPAN、2026 年 2 月 11 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2f76d64cefc0e983403bfd36e868fd61099fddd2>。

[2] 「米国との『核共有』、衆院議員 37%『検討すべきだ』維新は 36 人全員」、「毎日新聞」2026 年 2 月 27 日。

前者旨在将经济安全、粮食安全、能源与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风险最小化；后者则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造船等尖端技术，旨在构建所谓“不依赖特定国家的供应链”。^[1]其政策逻辑清晰：通过国家主导的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驱动力则来自全域化的“安全”需求。

与“安倍经济学”的货币宽松、灵活财政与结构性改革框架相比，高市内阁更加注重财政资金的先行投入，将政府定位为大规模投资的主导者。这一转向的背后，是“安倍经济学”的失灵——长期停滞、产业空心化、少子老龄化危机发酵，传统增长引擎已然熄火。在此背景下，由于防卫产业天然呈现“政府主导”模式，且具备巨大的产业链辐射力，高市内阁遂将其选定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领域，希望以防卫需求牵引产业布局，引导企业参与从研发到出口的全链条布局。2026年5月4日，高市在澳大利亚接受采访时明确表达了这一意图：防卫装备品出口“不仅能推动以防卫产业为首的各类产业发展，并能最终带动日本整体经济成长”。^[2]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更进一步提出，应将“强化防卫力→增加防卫装备采购→扩充防卫费”的单向消耗逻辑，扭转为“以军工外销创收反哺军备扩张”的循环回路。^[3]由此可见，高市内阁正着力提升防卫产业在日本国内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与地位，加大对军工企业的扶持力度。防卫产业膨胀产生的就业岗位、股市红利与地方财政转移，正在日本培育越来越多认同乃至依赖“战争经济”的群体。

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将“防卫力量”定位为“综合国力”构成的重要内涵，力争“以‘强大的经济’为基础，逐步确立‘强大的外交与安全

[1]「第221回国会における高市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2026年2月20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5/statement/2026/0220shiseihoshin.html>。

[2]「高市首相、防衛装備移転“5類型”撤廃『紛争の防止や日本経済の成長につながる』と意義強調 中東情勢での補正予算編成は『現時点ですぐさま必要とは考えていない』」、YAHOO! JAPAN、2026年5月4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f582ab4b71ebc29cad8501ad561dd094985834c0>。

[3]「小泉進次郎氏、防衛産業で『稼ぎます』費用増大を自力で補う方向に転換 原子力潜水艦にも言及」、YAHOO! JAPAN、2025年11月7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6c0fb388a4f5348426337406b05e807ed257d13e>。

保障’”，主张日本“有必要自主推进防卫力量的根本性强化”。^[1]这与二战后日本政府一直奉行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国家发展路线相比，是彻底的方向性逆转。对高市内阁而言，“防卫力量的根本性强化”既是施政目标也是政策路径，且将越来越倚重“防卫”路径来实现国家战略诉求，推动日本从“自我防卫”向“对外作战”国家转变，导致日本国家发展路线的价值取向大幅“向右”逆转。对此，日本学者古贺茂明一语道破：高市内阁将所有政策课题都冠以“安全保障”的名义，与“危机管理”一样，实质上都是“应对不测事态”，“其终极目标就是战争准备”。^[2]

（二）利益逻辑：政商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诉求

所谓“政商军工复合体”，是指自民党政权与军工企业之间形成的紧密利益共生联盟。在高市内阁执政框架下，这一复合体已成为日本“再军事化”加速的核心驱动力。

军工企业一直是日本政治过程中重要的利益集团。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 株式会社（原石川岛播磨重工）等为代表的军工企业巨头，都是同时生产经营防卫装备品与民用产品，拥有众多子公司和外包公司，在国内市场处于垄断地位。它们影响政府决策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向自民党提供政治捐款。

数据足以说明利益输送的规模。2012 年 12 月安倍内阁上台后，为推动政府增加防卫预算并扩大武器出口，2013 年防卫装备订购合同前 10 位的军工企业向自民党提供政治捐款 1.5 亿日元；2015 年，日本防卫装备工业会 31 家成员企业的捐款总额升至 3.9 亿日元。^[3]据日本独立调查媒体“探查”

[1]「第 221 回国会における高市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2026 年 2 月 20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5/statement/2026/0220shiseihoshin.html>。

[2]「自民党大勝でも…高市首相『成長戦略』の危険すぎる実態!『危機管理』という名目で日本が“武器輸出産業国家”になる日 古賀茂明」、YAHOO! JAPAN、2026 年 2 月 10 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0fb3d2bac6cd721069b95e57e4e4da61edd546f9?page=3>。

[3]王广涛：《军工利益集团与日本的安全政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12 期，第 44 页。

网站披露，三菱重工 1990 年至 2020 年累计向自民党捐款约 8.2 亿日元，其中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至少捐款 3300 万日元。作为“回报”，日本政府 2022 年底决定将 2023 至 2027 财年的防卫费总额增至 43 万亿日元，为此前 5 年的 1.6 倍；而三菱重工 2023 财年防卫相关订单额飙升至 1.68 万亿日元，为上一财年的 4.6 倍。^[1]

军工企业的政策影响力远不止于捐款。以“经团联防卫生产委员会”为中心，军工企业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其政策建议大多最终体现在内阁及防卫省的官方文件中。2014 年 4 月，安倍内阁决定部分放宽防卫装备品的出口限制，其背后真正的推手正是日本军工企业巨头们。^[2]在高市内阁为修订“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有识者会议”中，15 名成员中有 2 名成员来自军工企业，即东丽社长大矢光雄与 NEC（日本电气）社长森田隆二。^[3]他们代表的正是军工企业的利益诉求。高市执政后，军工企业迎来前所未有的扩张机遇：随着武器出口的彻底放开，从传统造船产业到新兴的无人机产业，订单规模大幅增加。

这正是政商军工复合体加速成型的缩影——政府主动作为与军工企业游说相互交织、彼此成就，“再军事化”已成为二者共同的利益公约数。在高市内阁的助推下，军工企业与自民党政权正加速结成利益关系更加紧密的政商军工复合体，左右政府决策。对此，日本学者古贺茂明警告：已与自民党深度绑定的防卫产业一旦规模扩大，政商军工复合体将完全掌控日本政治。^[4]这意味着政府决策或将失去纠错机制，进而导致日本再次在错误

[1] “Japan's major defense contractors made over 36 trillion yen since end of Cold War: Defense Contractors and Politics (1),” Tansa, October 8, 2025, <https://en.tansajp.org/investigativejournal/8888/>.

[2] 程蕴：《“武器出口三原则”的突破与日本军工产业的海外扩张构想》，载《东北亚学刊》2015 年第 2 期，第 15 页。

[3] 「安保 3 文書改定へ有識者会議設置 佐々江元駐米大使ら 15 人を発表」、朝日新聞、2026 年 4 月 20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V4N41YGV4NUQIP007M.html>。

[4] 「武器輸出全面解禁で日本は『戦争できる国』ではなく『戦争なしでは生きられない国』へ…高市首相は完全に平和主義を捨てた 古賀茂明」、YAHOO! JAPAN、2026 年 4 月 28 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5f122fc9f3cadb21987a5ba98daa29b245b0b839?page=4>。

的国家发展道路上“暴走”。

（三）政治逻辑：社会政治意识的右倾化趋势

“再军事化”进程的加速，并非仅源于高市个人及内阁施政的驱动，还与日本国内社会政治意识的右倾化趋势密切关联。换言之，高市内阁的安全保障政策取向，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迎合保守选民并扩大支持基础，二者相互驱动。与安倍第二次执政初期相比，当下日本民意结构已发生质的转变。

其一，安全焦虑被政府叙事系统性放大。2026年1月，日本内阁府每隔三年进行的有关防卫问题的舆论调查显示，认为“应当增强”自卫队规模与能力的比例为45.2%，创下1991年该问题纳入调查以来的最高值，而认为“应当缩小”的仅为2.2%；关于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持“肯定”及“倾向于肯定”态度的受访者合计68.3%，显著高于持“否定”态度的29.7%。^[1]“中国军力现代化及在日本周边的活动”以68.1%的占比成为民众最关注的安全议题，同样创下历史新高。^[2]2026年3月读卖新闻社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联合民调进一步显示，日本民众在安保议题上呈现明显的强硬倾向：74%的受访者支持强化防卫能力，70%赞成“将尖端技术应用于防卫用途”；即便是最敏感的“强化防卫能力增加防卫费用”一项，赞成比例也达到58%。^[3]这种“理念支持”向“政策背书”的转化效率，也是以往历届内阁所未曾拥有的，在野党在众议院的立法阻击空间被压缩至极限。

其二，右翼势力对舆论场的操弄，是民意转向的关键推手。在当前日本社会，包括美化、否认侵略历史及参拜靖国神社等在内，历史修正主义及排外主义言行均在扩散。以“日本会议”为代表的传统右翼社团持续活跃，

[1]「自衛隊『現状維持』が49% 増強は45%、内閣府調査」、YAHOO! JAPAN、2026年1月9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d5376fdbfa9ac43ec23f23f70b3d155cc2d59230>。

[2]「【速報】『自衛隊に関心ある』過去最高の82.6% 関心事項トップは『中国の軍事活動』 政府実施の世論調査」、YAHOO! JAPAN、2026年1月9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37301b397bddd4969b8da3f2d2c21c1f05af25a3>。

[3]「防衛力の強化に『賛成』74%、防衛費増額に『賛成』は58%…読売・国問研共同世論調査」、『読売新聞』2026年3月26日。

横跨政界、宗教界、教育界与地方自治体系，推动修宪、历史翻案与军备扩张；与此同时，网络右翼势力迅速崛起——这一群体的骨干为 Z 世代等 18—29 岁青年，以匿名化、情绪化、攻击性方式在社交媒体散布厌外排外、扩军修宪、否认侵略等右翼主张，利用“饭圈化”造势、雇佣水军控评、算法投放流量，营造支持高市的“信息茧房”。在 2026 年 2 月众议院选举中，网络右翼力挺高市及自民党，高市以更右翼言论迎合网络民粹，形成政网联动的“右翼螺旋”，成为高市及自民党赢得选举的核心策略之一。

在国内社会政治意识右倾化的大背景下，高市内阁的安全保障政策取向获得了相当的社会支持。2025 年 11 月，针对上述高市首相发表的涉台谬论，回答“恰当”（含“倾向于恰当”）的受访者合计达 61.0%。^[1]同年 12 月，针对高市内阁对中国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有 59.6% 的受访者表示“予以肯定”，表示“不予以肯定”的仅占 29.7%。^[2]物价高涨、养老困境、治安隐忧等问题加剧舆论不安，使得日本民众在政治生态劣化的情势下更倾向于支持立场保守乃至强硬的领导人。^[3]高市内阁正是通过日本“再军事化”迎合保守选民，从而扩大了社会支持基础并赢得 2026 年众议院选举。

其三，民意内部仍存在深刻的结构性撕裂。也要看到，日本社会并非铁板一块地倒向右倾，和平主义传统仍有深厚根基。读卖新闻社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2026 年 3 月的联合民调也揭示了日本民众“要军备不要增税”的矛盾心态：当被问及如何筹措防卫费时，仅 7% 的受访者选择“增税”，40% 选择“削减防卫以外的预算”。^[4]读卖新闻社 2026 年 3—4 月民调显示，宪法第

[1]「高市内閣支持率 75%、高水準維持 存立事態答弁『適切』6 割 産経・FNN 合同世論調査」、『産経新聞』2025 年 11 月 24 日。

[2]「政府の対中姿勢、59.6%が評価 緊張状態『心配』も 53.9%」、『産経新聞』2025 年 12 月 22 日。

[3] 张勇：《当保守遭遇民粹：高市早苗冲击与日本外交失衡》，载《外交评论》2025 年第 6 期，第 36 页。

[4]「防衛力の強化に『賛成』74%、防衛費増額に『賛成』は 58%…読売・国問研共同世論調査」、『読売新聞』2026 年 3 月 26 日。

九条第一款的维持支持率高达 80%。^[1] 次月，共同社民调显示，57.2% 的受访者反对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赞成者仅 37.1%。^[2] 这表明，日本民众对“强化防卫”的理念支持，并未转化为对高市内阁扩军路线的全面背书。

四、日本“再军事化”的危害及根源

民意与政策之间的脱节，并未让高市内阁放慢脚步。在“高市一强”的权力格局下，“再军事化”仍在加速推进，对日本国内民生、地区安全局势以及战后国际秩序均造成严重危害，中日关系更是深受其害。这些危害的根源则来自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抬头。

一是在国内民生层面上，大规模的防卫费支出正在挤压社会福祉资源。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动辄以千亿日元为单位出现结余，其需求核算的合理性早已遭到质疑：“在社会保障费增加等导致财政运营本就严峻的情况下，唯独防卫费缺乏严格审查、无限制增长”。^[3] 它从一个侧面说明，财政预算支出正在高市内阁的推动下“过度”向防卫领域倾斜。但历史经验早已证明，军事扩张无法带来长久的经济繁荣。这种代价已在民意层面显现。2026 年 7 月以来，日本多家主流媒体民调均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尽管各机构绝对值差距明显，从《每日新闻》的 41% 到《读卖新闻》的 57% 不等，但共同指向同一个趋势：高市内阁的民意基础正经历结构性松动。其中《每日新闻》7 月民调最具标志性：支持率较 6 月骤降 10 个百分点至 41%，不支持率升至 44%，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出现“死亡交叉”。^[4] 2026 年

[1] 「憲法改正『賛成』57%…読売世論調査」、「読売新聞」2026 年 5 月 3 日。

[2] 「殺傷能力持つ武器輸出に賛成 37%、反対 57%」、YAHOO! JAPAN、2026 年 5 月 17 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80083c70daaa03818e3150154c9517c81522b2e9>。

[3] 「【社説】安全保障政策 平和国家揺るがぬ論戦を」、YAHOO! JAPAN、2026 年 1 月 31 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935446f51a11adcdaba0ee45e77fecdf3f0aa5a1f>。

[4] 「内閣支持率が大幅下落 41% 不支持率が逆転 毎日新聞世論調査」、「毎日新聞」2026 年 7 月 19 日。

8月共同社最新调查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50.2%，较7月再跌3.5个百分点，录得该社发起调查以来的最低值。^[1]民生治理效能低下，正持续削弱高市内阁的民意支持基础。

二是在地区秩序层面上，日本“再军事化”打破了亚太地区长期形成的军事力量平衡局面，严重损害地区安全互信，可能诱发韩国及部分东盟国家随之展开军备竞赛，导致朝鲜半岛、南海等地区热点问题更趋复杂。同时，日本“再军事化”带有浓厚的历史修正主义价值取向，是对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严重侵蚀。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右翼政客否定和美化日本对外侵略历史，彻底放开武器出口，背弃日本重返国际社会时作出的“和平国家”政治承诺。如果任由高市内阁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加速，势必将加大危机管控难度并抬高地区冲突风险，从根源上冲击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

三是在对华关系层面，危害最为直接且深远。如前所述，高市内阁推动的日本“再军事化”带有浓厚的涉华目标指向，妄图强化对华军事遏制态势。自2025年11月以来，高市多次公然发表涉台谬论，暗示日本武力介入台海的可能性，性质极其恶劣。与此前聚焦台海方向相比，高市内阁最新提出的“强化太平洋防卫”战略，表明日本将在更大程度上融进美国遏华战略布局并介入地区秩序构建。2026年6月，日本防卫省通过渡轮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及中型无人侦察机从千叶港运抵日本最东端的南鸟岛，首次将岸舰导弹部署至日本最东端的这座离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这一部署标志着日本在美日同盟对华军事围堵体系中的角色正从“西南防卫”转向“太平洋防卫”，自卫队的实力存在将从“第一岛链”外延至“第二岛链”，严重扰乱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稳定。

高市内阁执政以来的中日关系陷入了冷战后最严峻、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低谷期，两国政治互信近乎崩塌，经贸、科技以及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严重受阻。毋庸置疑，中日关系陷入低谷期的责任完全在于日方。在高市内阁拒不撤回涉台谬论的情况下，中日关系短期回暖空间极度狭窄。

[1]「消費減税、71%が財政に不安 内閣支持率は最低更新50%」、共同通信、2026年8月23日、<https://www.kyodonews.jp/news/>。

需要指出的是，比日本“再军事化”本身更值得警惕的，是驱动“再军事化”的底层逻辑：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图穷匕见，才是危害的真正根源。^[1]在近现代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外实施侵略扩张及殖民统治，曾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二战后的日本虽历经民主化改革，但其国内始终存有一股美化侵略历史并主张扩军备战的军国主义“阴魂”。例如，2026年8月，防卫相小泉在参拜了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之后，又启程出访澳大利亚、印度兜售武器。日方的种种操作，就是在为军国主义招魂，名目张胆地让“新型军国主义”成为破坏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现实祸源。

高市内阁执政下的日本国家发展走向，已呈现“再军事化”加速与“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并行的基本态势。二者互为表里，却不可等同：“再军事化”是具象化的政策手段，而“新型军国主义”则更深地扎根于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之中——它不再主张赤裸裸的军事侵略扩张，但其国家主义、军事至上、极端排外主义倾向与传统军国主义的思想内核高度契合。二者在高市内阁的施政体系中已形成相互赋能、循环强化的内生闭环，“新型军国主义”是推动“再军事化”加速的根本动因，而“再军事化”则是实现“新型军国主义”的必经路径。高市内阁借助“新型军国主义”的话语叙事为“再军事化”提供驱动力与“合法性”支撑，而“再军事化”的推进又反过来推动“新型军国主义”要素在政治体制中完成定型，继而催生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扩军。正是这种相互交叉与渗透，使得高市内阁推动的“再军事化”进程加速，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加速抬头、乃至走向体制定型的过程。

结 语

高市内阁执政框架下的日本“再军事化”进程，不仅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加速”状态，更是具有包括防卫、经济与外交等多领域在内的体

[1] 寰宇平：《突破底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载《人民日报》2026年8月14日，第3版。

系性内涵。并且，在日本“再军事化”进程中，高市内阁借助国内右翼政治势力膨胀的支撑，其权力运行也趋于强势。与此同时，高市内阁的战略意图及日本“再军事化”的具体内涵，均带有妄图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历史修正主义属性，且与美国持续推进大国竞争战略背景下的地缘安全环境密切关联。尤其是高市发表的涉台谬论，“充分暴露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遗毒远未根除，披着‘正常国家’化外衣的新型军国主义正在日本加速抬头”。^[1]

“再军事化”与“新型军国主义”的相互叠加，将严重威胁日本近邻国家、地区安全稳定及战后国际秩序，且已导致中日关系发展遭受损害，须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并加以坚决抵制。可以说，抵制日本“再军事化”，就是遏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对日本而言，高市内阁推动“再军事化”进程加速，短期内或将提升所谓“军事威慑能力”，但最终必将“反噬”本国的安全与发展。日本理应牢记因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而遭受惨败的历史教训，避免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如若执意重走穷兵黩武的老路，必将是一条自取灭亡的不归路。

【收稿日期：2026-03-06】

【修回日期：2026-08-26】

（责任编辑：邢嫣）

[1] 杨伯江、王一晨：《高市早苗错误言行暴露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倾向》，载《光明日报》2026年1月12日，第14版。